



总统秘密战

战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

〔美〕约翰·普拉多斯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541828



2 017 7127 0

总统秘密战

——战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

〔美〕约翰·普拉多斯 著

谢勇 梁东 张鸿良 李淑芹 译

辛酉校



时事出版社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JOHN PRADOS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6

总 统 秘 密 战

——战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

[美] 约翰·普拉多斯 著

谢 勇 梁 东 张 鸿 良 李 淑 芹 译

辛 酉 校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 字数: 346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1—3500

ISBN7-80009-080-9/D·37 定价: 6.00元

60669/7

出版说明

《总统秘密战》一书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约翰·普拉多斯所著，1986年纽约威廉·莫罗公司第一版。全书介绍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在从事秘密战争的行动中最吸引人而又最不容易为人所知的事实，也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具有难言之隐的方面——旨在改变各国命运与全球的政治方向。

实际上，美国在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从而建立中央情报局，法案中根本没有提到要搞什么隐蔽行动，只不过写上“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时指出影响国家安全的……此类其他职能与义务……”。在《总统秘密战》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类其他职能”是如何囊括了一整套在规模与范围上令人吃惊的准军事技术。它告诉了人们，在第二次大战后的早期，中央情报局如何从事广泛的秘密行动，包括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游击战推翻这些国家的政府。这里还述及5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伊朗和危地马拉取得有成果的行动，使那里的政府真的被推翻了。不过，也有其后在古巴和印尼丢脸的彻底失败的准军事行动。本书还提示了一项至今尚鲜为人知的最大规模的秘密行动，即中央情报局帮助西藏

人从事反对大陆上中国人的斗争。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包括在柬埔寨，尤其是在老挝，“秘密行动”所扮演的惊人角色。在这里，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和政治上操纵当地政局达到了空前甚至绝后的高度”。本书也研究了里根时代在中美洲和非洲所采取有争议的行动。

作者对该书取材广泛，包括各种回忆录、报刊杂志文章、某些具体准军事行动的研究成果及官方史志等，还参考了大量政府文件及利用了许多新近才解密的档案材料。约翰·普拉多斯这位专写情报工作的作家，在美国外交政策最为秘密的方面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揭示其内幕的窗口。因此《总统秘密战》一书，可视为一本有关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情报机构活动的重要著作。

阅读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外行动与对内关系的一些脉络，它的产生、发展和结果。它的利害得失与乎取舍从违，正如作者所说：“中央情报局建立已有四十年的历史，现在已到应该作出一种估价的时候了。”旁观者清，读了它可以帮助读者明今测来和人们所处的现在国际环境。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本书所要讲的话。

1989年4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冷战的严酷考验	(5)
第 二 章 反苏的秘密战争	(26)
第 三 章 “我们下次非干好不可”	(44)
第 四 章 在亚洲的冒险	(64)
第 五 章 秘密军团	(85)
第 六 章 苦果	(101)
第 七 章 “制造与利用棘手问题”	(122)
第 八 章 群岛	(148)
第 九 章 世界屋脊之战	(175)
第 十 章 古巴I: “另一个加尔各答黑洞”	(203)
第十一章 古巴II: 从“冥王星”到“猫鼬”	(233)
第十二章 冷战与反叛乱	(263)
第十三章 越南	(288)
第十四章 高原	(315)
第十五章 全球范围	(359)
第十六章 桀骜不驯的“离群之象”走向新生道路	(396)
第十七章 秘密行动	(431)
第十八章 总统、政策及准军事主张	(489)

引 言

自1975年所谓的“情报年”以来，至今已十余载。当年情报部门曾分别受到总统府调查委员会、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调查。从那以后，风云变幻，时至今日情况已完全不同。今天，要求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不加羁绊的呼声同样震耳欲聋，压倒了对要求改革情报工作的呼声。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随便哪场情报改革运动都是个不了了之。国会满足于不疼不痒的“监督”，而情报人员的汇报也尽其所能周详地，同时又殚精竭智、巧妙地对现存法令作出了最易于为人所接受的解释。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则着力于让情报专家们放手大干，造成的一项结果就是公众对1983～1984年在尼加拉瓜港口设置水雷一事的强烈愤慨。在尼加拉瓜港布雷事件中，参院专设调查情报业务的特别委员会对情报工作的监督特权受到了公然地挑战，该特别委员会的副主席在多方劝阻之下才没有辞职。此事刚刚过去一年，情报部门的法定权力和权限问题，就被视若“弁髦”地搁置一边。

在1985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任总顾问和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们一致认为，要求改革情报工作的压力业已过去，这是一件好事。

今天，以下两个问题依然如故：在一个民主国家，情报

组织怎样的活动才算适度？这些活动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70年代加上国会的正式监督并没有使这两个问题得到任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冷静考虑，而不要等到情报工作再来一次惨败才导致热烈的争辩。从目前情况看，出现在尼加拉瓜港口布置水雷的失误，或者确切地说，另一次猪湾事件的惨败，只是个时间问题。

为了尽可能真正反映出问题之所在，我选择了秘密行动为本书中心议题，其中又以准军事行动为论述重点。所谓准军事行动，即美国动用武装力量去支持以影响其他国家重大事态的发展。至于通过情报部门对他国政府施加影响，搞谍报活动及情报分析等问题，本书只是在与所述主题有关时才加以论及。准军事行动虽然并非秘密行动的唯一形式，但它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秘密行动。然而，我们几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对准军事行动的有效性进行得失对照式的检查，也没有列出一份这些年来如何控制这种秘密行动有章可循的记录。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已有40年的历史，已到了该作出这种估价的时候了。

准军事行动到底对美国国家安全作出了多少贡献？我们能找出在这些不同的秘密行动中一再出现的共同问题吗？假如适当的准军事行动是必需的，那么应当如何对其进行组织和管制？在这种行动中，总统已经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国会应当起什么作用？我们对这些涉及面非常广泛的问题难以作答，因为关于情报工作的文献记载，一直侧重于陈述各项具体行动。

虽然对于情报部门训练有素而技术又高超的官员应该予以应有的尊重，但情报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不应只由

这些秘密行动的实施者们来决定，他们总想让自己的绝招露出一手，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既得利益之所在。维护我们美国民主制度的唯一途径在于对情报部门的授权应加以限制，同时要求情报部门有义务对其行动作出恰如其分的汇报。

以上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于思考透彻，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我们公众无法得到必要的信息。本书力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对准军事行动进行全面研究，但并不纠缠于某个具体事件，同时对准军事行动能力的发展及控制机制的研究也一直予以注意，并加以详述。

本书所用资料全部是从公开记录中搜集的，来源包括各种回忆录、报刊杂志文章、对某些具体准军事行动的研究成果及官方史志等，同时还参考了大量的政府文件。《情报自由法》之获得通过及开放历史文件的法令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尽管这两项措施在最近几年已经不那么有用，因为现政府对文件保密持截然不同的态度。然而，本书这样一部著述竟可以完全从公开记录中整理而出，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企图通过控制政府文件的开放来压制公众舆论是何等徒劳。

通过研究准军事秘密行动来对情报工作政策提出问题，其优势在于这种秘密行动不可避免地会为人所知，这是由其自身性质所决定，无论如何想保密也无济于事。这样，如果情报官员想暗示更高一级的权力机关对秘密活动早有知晓，因而曲解档案所记录的事实，这种研究就会使他们这种手腕不可能得逞，或至少是不可信。

现在是重新讨论情报工作改革的时候了。“放手”让中央情报局去干，其实对它自身也没什么好处：中央情报局在

弗吉尼亚州兰格雷市的总部大楼正面墙上有许多星星，它们是为纪念其殉职人员而镌刻的。刻于1983年春到1984年秋的8颗星表明，在这短短时间内，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死亡率是该组织有史以来年平均死亡率的8倍。这些殉职者大多数是秘密行动或恐怖活动的牺牲者。

约翰·普拉多斯
1985年2月于华盛顿

第一章

冷战的严酷考验

院子里的人拿着手提式轻机枪，他们并没有任何威胁，只不过要些吃的。身为主人的那个德国农民给了一些饮食，他们跟着就离开了那里。这些人刚一走，这个农民就将此事报告了地方当局。瓦尔登冉那的警察也接到其他报告，表明奥德边境一带的森林中有武装人员出没。进一步的调查很快就证实确有身份不明的一股武装帮伙在活动。为了捕获这些入侵分子，瓦尔登冉那警察当局便向帕绍的中央警察总部提出要求，请派兵进行增援。

帕绍警察总部就这样遇到了难题。本案发生于1947年9月，当时德国在胜利的盟军占领下，帕绍是美军占领区。当地警察向美军军官报告了此事，在因河以北出没武装帮伙的消息可能暗示着苏联在采取某种军事行动。此时德国警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按作战程序行事：即任何与外国公民有关的事宜都属于美军反谍部队（CIC）的管辖范围。帕绍的一位警官打电话告诉设在慕尼黑的美军占领区总部。美军反谍部队决定在奥德边界沿线的山中搜索这股帮伙。从慕尼黑来的特工人员开车前往瓦尔德克钦，然后呈扇形朝边界方向散开，与德国警察汇合。此时，这些德国警察也配备了手提式

轻机枪。

9月10日凌晨3时，反谍部队的一组搜索人员听见树林中有人声，便发现了这股帮伙。他们确实有不少人（大约40多名），身着苏军军服正坐在营火旁，而且其中大部分人还在唱歌。搜索小分队便小心翼翼地向他们的营地慢慢地包抄了过来。

这些入侵者并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事实上，当他们得知逮捕他们的是美军时，反倒如释重负。拘捕者随即就了解到这是一支按苏联军队规格组织起来的队伍，武器装备有手提式轻机枪和手榴弹。军服和他们一样，武器也是苏制的。他们的语言最初听起来也像是俄语。这些入侵者乖乖地缴了械，然后就被押往帕绍，随即又押送到法兰克福城外奥伯鲁塞尔的美军反谍部队基地。在那里，反谍部队派其苏联情报专家负责对这些人的工作。在营地被捕的共35人，随后几天，又有4人在几个不同地点被拘捕。结果发现他们原来是同一班人马。美国对此事所进行的全部调查则严格保密。

记者们报道了一部分事实，更多的属于谣传。当时，欧洲对于无家可归者和东西方之间交换俘虏已习以为常。即使这样，巴伐利亚出现武装帮伙也非同寻常，有其新闻价值。合众社的一位记者在事发后几天去过帕绍，搞到一份与事实出入很大的新闻：即这些俘虏已向美国反谍部队招认，他们是乌克兰的反苏游击队。然而还有其他种种臆测，说这些俘虏乃苏军逃兵；说他们是波兰的反苏游击队；又说他们只不过是装备精良的土匪。

美军反谍部队对这些人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审查了解。审讯官们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原来确实是乌克兰游击队。他们误

认为一场反苏战争仍然在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南部继续着。他们提供了有关乌克兰游击组织及东欧政治状况的大量情报。法兰克福的美军反谍部队军官于1947年10月5日上报了这一材料。

了解到东欧反苏游击队活动的详细情况是美国情报工作的一个意外收获。不过，华盛顿认为得此情报并非只是对苏联政治情况有个现状的了解。进而有些美国官员认为，乌克兰游击队的情报意味着一个采取反苏秘密军事行动的良机。美国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成为冷战时期进攻性行动的开端，一种典型的秘密行动。美国正是从那时期开始具备了从事各种情报战、心理战的能力，包括采取秘密军事行动的能力。

自从1947年的那一天以后，美国的秘密战争几乎遍布各大洲。卷入这些秘密行动的有成千上万的当地士兵，美国地下特工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甚至包括美国的正规军事部队。美国的干预无所不包，从提供咨询服务到武器供应，从全力支援对独立国家的侵略到以秘密轰炸以支持地下军事行动。这种国际范围的高压政治，并非什么新鲜事情，也不是美国的独家发明。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人看到了运用特别军事行动的潜在可能，并造就了一批擅长于特别秘密军事行动的骨干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都至关重要。美国发现其英国盟友是秘密行动的热心参加者。当时反抗德国占领的战斗网点遍布欧洲。为了配合各反德抵抗运动，英国人便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成绩卓著的特别行动执行部（SOE）。特别行动执行部的特工人员为诸如挪威、希腊以及缅甸等国提供参谋服务及武器装备。其他人员则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到马来亚这

样一个大范围内执行特别任务。特别行动执行部的宣传者则以形式多样的情报活动，包括提供假情报来帮助这些秘密行动。

早期美国情报官员就受益于英国的榜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设立了战略情报署（OSS）以开展各种情报工作。战略情报署在绰号为“勇猛的比尔”的威廉·J·多诺万（或译杜诺万）领导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活动，在地中海、北欧、缅甸和中国等地都设有主要的指挥基地。战略情报署的行动队在法国和挪威内地空降其特工人员，在巴尔干国家炸毁桥梁，在意大利帮助游击队作战，在缅甸领导部族人的队伍抗击日军。战略情报署的军官还负责侦察敌军行动，并为美军司令官提供精辟的情报分析。

随着战争的进程，美国军方也取得了开展秘密军事行动的经验。当时常常需要军队去帮助完成某些秘密行动，如秘密运送更多的特工人员登陆或运送给养等。海军用潜艇和鱼雷快艇完成这类任务，空军则用飞机。陆军实际上在菲律宾领导着一支抗日游击力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还分别组成了精锐的突击队，执行突击任务。陆军第5307混战旅，可能以它的“梅里尔突击手”这一浑号更广为人知，在缅甸战役中与战略情报署密切配合，功勋卓著。

事实上，正是缅甸战役最明显地展现了未来秘密战争的标准行动之雏形。战略情报署一支名称平淡无奇的部队，称为情报大队101支队被派往印度，在其行动地区附近建立了基地。101支队的特工人员渗透到缅甸山区，与当地的克钦部族人建立联系，开展游击战以抗击日本。武器、给养以及战略情报署的军官有时是被空投到丛林之中，有时也就是由

美国空军组织的“空中突击队”所属飞机载入该地区。

战略情报署的军官逐步建起地方谍报网、流动武工队，最后建成了克钦游击部队。到1944年，克钦游击队已在与梅里尔突击手及英国钦迪游击旅协同作战。一年后已有10000多克钦人参加战斗，其中包括由战略情报署领导的7个450人的野战营。克钦游击队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为60多位深入日占区的谍报人员及400多位负责侦察附近敌军据点的特工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在盟军的最后攻击中，克钦野战军帮助盟军围歼了两个日军精锐师。

这是战略情报署取得的一项辉煌成就。101支队虽然只有300人左右的力量，但它成功地驾驭着30倍于它的军事力量，并通过这支军事力量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军事行动。情报大队101支队荣获美军颁发的一项特别奖。

战略情报署组织缅甸部族人的规划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在整体的游击队伍中组织正规的军事单位；在游击区的某些地带清除敌军以建立当地的游击基地；在游击队的组织、训练期间利用谍报网络对其进行保护，继而为它们寻找进攻目标；利用外部基地进行特种训练并获取主要援助；利用秘密的空中渠道，在地方基地与外部基地之间提供给养与联络。这些技术成了秘密战争战术的基本特点。这种能够产生类似正规军军事力量的秘密行动后来被称为“准军事行动”。

在欧洲舞台上当然也有战略情报署的戏。战略情报署在那里的武工队协助救援欧洲大陆上空执行突袭任务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还与反德抵抗战士协同作战。战争期间战略情报署所采取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与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有

关。当时，整个登陆计划中情报工作部分，以萨塞克斯为代号。需要空降特遣部队来支援登陆以补充当地抵抗力量之不足。美国战略情报署、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和法国情报机关各自派出自己的特工人员，组成了90个3人一组的“吉德博”行动小组，将其派往选定的抵抗运动活动点。吉德博成员空降时穿着军装，但他们随身带着便服。有11个特别行动大队作他们的后盾，这些大队是为完成此次突击任务而组成32人一队的突击队。

欧洲行动非常成功。到登陆开始时，单是战略情报署一家在法国就有500名法国特工人员和375名美国特工人员。参加吉德博行动小组的美国人中有一半以上因作战英勇或表现出色而受勋。抵抗力量的行动也功勋卓著，使德国对诺曼底登陆反应迟钝，并为盟军提供了最关键的情报。在后来的战役中，战略情报署成功地使多达200多名特工人员直接渗入德国。不过，这些人几乎都是纯粹执行谍报任务。

除了战略情报署以外，陆军反谍部队也通过其在敌占区规模小得多的特工网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反谍部队的活动始于1942年，准确地说是始于美国人进入欧洲战区之时。反谍部队的特工人员在意大利的功绩特别突出，他们帮助鉴别纳粹分子，使他们无法渗透到支持同盟国的意大利游击组织中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提供了经验，而且使参战的情报部官员们形成并强化了某种思维方式。这场战争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到底是与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作战还是不战。不对他们作战显然就是面对外国侵略及其恶毒的意识形态而放弃自己的职责。战争结束后，战时的敌意和战术便很容易转

移到新近形成的对手身上。

这种充满敌意的哲学最初还无关重要。1945年8月日本投降带来了一场大批军人复员所产生的混乱，这种混乱也波及情报机构。战略情报署的力量已经发展到12000人，而杜鲁门总统却通过其行政权力，于1945年9月20日下令解散战略情报署。根据这种新的安排，战略情报署原来一直负责情报分析工作的部分移交给了国务院；由从事秘密作战的军官所组成的特工队则划归陆军部，另成立战略情报处（SSU），由原来战略情报署的特种战争负责人马格鲁德准将统率。

马格鲁德将军的任务不在于维持或扩充战略情报处，而主要是将它告一结束。1946年初他完成了大遣散。战略情报署时期那些曾参加过吉德博小组、克钦游击队及其他行动的军官们回到了各自的家园，有的回律师事务所，有的回学校或部队。战略情报署及战略情报处派往越南的行动队被调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曾在越南见到了胡志明，向他提供建议如何反对当时美国的那套政策，而正是该项政策最终导致我们在那里进行战争。战略情报处1946年由威廉·W·奎因接管时已减少到不及200人，在国外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也仅有7个。

除了战略情报处外，陆军反谍部队仍然是秘密军事行动的中心。它受辖于军事情报部门，或称情报部（G-2）。

情报部扮演的是陆军官方情报机关的角色，因而最便于在东欧采取行动，进行反苏活动。因为陆军作为美国军事占领的一部分，在德国、奥地利和日本都驻有军队。美国与反苏的俄罗斯政治逃亡者之间联系最初就是由情报部建立的。早在1945年8月就采取了行动，吸收熟知苏联人的前德国

